

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巴金研究論集

重 庆 出 版 社

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巴金研究论集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重庆

责任编辑： 王致中

封面设计： 闵 翔

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巴 金 研 究 论 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插页 4 字数 237 千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00

*

ISBN 7-5366-0503-X

I · 101

定价：2.80元

编辑说明

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巴金的故乡成都召开了全国性的巴金创作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一些不能到会的巴金研究者，也寄来了论文和翻译文稿。开这样的巴金学术讨论会，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会议期间，不少同志建议编辑一套“巴金研究丛书”，逐年地、较为集中地反映国内外巴金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个建议得到了重庆出版社同志的支持。他们首先承担了“丛书”第一辑的编辑出版工作。

“丛书”第一辑是从六十多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内容上，适当集中；角度和观点，力求新颖；同时注意资料性和鼓励不同意见的、同志式的争鸣。

我们的主观设想是否如愿以偿，还有待广大读者和专家的鉴定。

本丛书编委会由以下同志组成：

主 编：	王 瑶	贾植芳	
副主编：	陈丹晨	谭兴国	
编 委：	李存光	唐金海	陈思和
	李 辉	汪应果	艾晓明
	余思牧	张 挺	张慧珠

舒 成 杨 萧 谭洛非

华忱之 李多文

这一辑的选编工作，由编委会委托谭兴国同志负责。

目 录

巴金，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陈丹晨（1）
1977—1984年巴金研究述评·····	李存光（11）
巴金美学思想初探·····	谭兴国（30）
谈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兼评“革命民主主义者”说·····	刘思久（60）
巴金小说文体论·····	花 建（103）
试论《寒夜》的思想艺术成就·····	张 挺（118）
论《憩园》·····	岳 安 韩金英（135）
附：巴金故居复原略图	
《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异同论·····	辜也平（160）
巴金与外国文学·····	曼 生（182）
巴金和俄罗斯文学·····	[新加坡]吴桑格著
	张晓云 王彦彬译
	贾植芳校（202）
巴金《家》的修改·····	龚明德（246）
《草堂》与巴金早年新诗及其它·····	惠 文（265）

巴金在国外（摘译）……………[苏]A.H.热洛霍夫采夫著

杨迪秀译（271）

巴金在法国（1927—1928）

——《巴金年谱》节选……………

陈思和 李 辉 岑 光（275）

巴金，不仅属于中国的， 也是属于世界的*

陈丹晨

关于巴金研究工作，自从我们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以来，与其他各个领域一样，取得了进展，并已成为最近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公认成绩较大的一部分：不仅有了许多深入评述巴金及其著作的研究文章，开始出现了一些专门著作，有了一批精心研究巴金的专家和学者，而且在对巴金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对这位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有着较深分歧看法和误解的作家有了较为正确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也就是说，人们拨开了曾经笼罩在这位杰出作家头上的种种迷雾，抛弃了曾经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误解和诬陷，使我们真正比较接近了他，看清了他。但是，我认为我们还不敢说已经充分地认识了他，真切地认识了他，深刻地认识了他。譬如说，至今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一些对于巴金的误解和不正确的评价；又如，我们许多研究工作者在发现巴金早期资料和探讨他的早期思想、创作方面作了大量重要的有益的工作，但是对于他在这几年出版的新作《随想录》的评介和研究方面却是不够理想的（迄今大概不到十篇评论文章）。现在，一篇普通小说的发表，有时就会随之出现一连串的座谈讨论，连篇累牍的鼓吹。而对这位老作家的这些新作的反映

却远不如海外读者和学者那么深刻，那么强烈。因此，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行呼吁，让我们更好认识自己的责任：不仅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巴金，还要帮助我们的读者更充分地认识巴金。

1979年，我在写完拙著《巴金评传》最后一段话时，曾经提出：“他（巴金）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出于一种感情用事。最近几年来，大量事实说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愈来愈感到巴金是一位世界性的伟大人物，是一位有国际威望的著名作家。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研究世界文学现象中的一个课题。

这里，我想列举一些已为大家熟知的事实：

1982年，意大利卡森蒂诺文学、艺术、科学、经济研究院授予巴金“但丁国际奖”。巴金的作品在意大利有很高声誉，他的《家》、《寒夜》、《憩园》等一度名列畅销书之冠。据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安娜·布雅蒂说：鲁迅和巴金是意大利人最熟悉的两位中国作家。

1983年，法国政府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种勋章在法国是最高的荣誉。密特朗总统亲自到上海授勋，亲手将勋章的绶带佩戴在巴金胸前，并发表了十分友好热情的讲话，高度赞颂巴金是“大师”、“不朽作家”、“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该校对于巴金的莅临，认为“不但是本校的莫大的光荣，相信也是香港人所同感欣幸和荣幸的”。香港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赞成这个评价。《快报》短评说：“这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来港，确是香港文坛的一件盛事”，“不但可促进香港与大陆的文化关系，更对香港的文

化生活产生励进作用。”《大公报》短评说：巴金亲自接受中大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对他是一种光荣，对中文大学和香港的学术界，更加是一种光荣。”

1985年，美国文化艺术学院宣布授予巴金名誉院士的称号。

除了上述最近几年连续得到的这些荣誉奖、称号和学位以外，巴金在国际活动中受到人们的特殊尊敬和崇高评价同样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9年，巴金应邀访问法国。法国文学界称他为“大师”，评论家把他比作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法国作家彼埃尔·让·雷米在《世界报》对巴金进行评论说：“综上所述，难道可以说巴金是他这一代至今尚活着的三、四位最伟大的作家中的一个吗？”法国是一个文学历史丰富悠久的国家，一般不轻易高度评价别的国家的作家。他们对巴金的热情不是偶然的。

1984年5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在二百多位各国作家中，有七位作家被推为“大会的荣誉客人”，中国笔会中心会长巴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法国新小说派创始人阿兰·罗伯-葛利叶，美国作家库特·冯尼戈特，威廉·斯蒂伦，英国笔会会长、评论家法朗西斯·金，英国作家阿伦·西里托，流亡在美国的苏联作家瓦西里·阿克西诺夫）。东道主（日本）在大会开幕式上介绍这七位特邀客人时，按东方尊老敬贤的习惯，首先介绍巴金，称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文豪。据现场目击者说，巴金讲演时，大厅座无虚席。整个会议期间，这种盛况是独一无二的。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说：“巴金先生是一只雄健的鹰，他来参加大会，即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是一种威严，一种力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空川寅雄说：“对巴金先生的敬重，不仅是日本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感情。”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巴黎版）驻东京记者克里斯蒂·恰普曼说，巴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赢得了读者；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的七位荣誉客人中，“巴金是激动人心的中心。”

1984年10月，巴金在香港访问期间，许多报纸（包括左、中、右各派的中外文报纸）都表示了热烈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当代文坛巨人”。十多天中，报纸连续用大量篇幅报导和评论了巴金的活动和著作，在知识界和青年中间出现了一股“巴金热”。有一位记者生动地描述了巴金接受学位步出礼堂之后的情景：当时“巴金便成为争相邀请合摄照片的对象，还有不少观礼嘉宾与他握手道贺。……经过一番‘扰攘’后，港督才有机会与巴金稍作寒暄，他们是以普通话交谈的。一向被记者追缠得透不过气的港督，这次却有点备受‘冷落’，直到和巴金一起时，才重新吸引得记者的注意。难怪有人说，‘巴金是今天学位颁授典礼中的主角’。”

巴金得到这样的荣誉和热诚的欢迎当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种外交礼遇，而是他的作品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间隔，穿透了民族和地区、政治和文化上的厚壁，征服了读者的心，唤起读者情感上的升华和人性的觉醒，以及对强暴的反抗。巴金作品中渗透了美好的理想（希望万人幸福的新社会的出现）、深厚的人道主义（与反对专制残暴相联系的）和对人类的爱（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成了生活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得以相互沟通、理解、感染的共同语言。因此，巴金作品中虽然主要是反映旧中国的苦难生活，是“文革”中的可怕经历，但是他打动的不仅是中国读者，也还有海外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

1980年4月4日，巴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作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在这前夕，日本女作家丰田正子受命核对译稿，

她说：“那真诚的语言激烈地震撼着我的心。读着读着，我流下了热泪，继而泣不成声，无法再读下去，只好停下来……。”

1983年10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在中国演员英若诚帮助下排练演出了巴金的《家》。许多观众为瑞珏、鸣凤、觉新、觉慧的命运流下了眼泪。评论界高度评价了这次演出，认为，“使美国人深刻地理解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后来发生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钥匙。”这次演出后来在大学生戏剧会演中还得了奖，还拍成电视片多次播映。在美国，《家》和巴金研究早已成了学位论文的研究专题。

就是那几册《随想录》所激起的反响也是极为动人的：

香港女作家余琦琦在她写的专访中说：“我花了一整个晚上，读完了巴老送给我的《病中集》，我的枕袋都湿透了。病魔和往事对巴老的折磨，真是太过了。但是，巴老的坚强、乐观求生和坚持到生命尽头的创作意志，却是我衷心敬重的。”

日本著名戏剧作家木下顺二就巴金的《随想录》说：“你尖锐地自我批评，自我解剖，这是很痛苦的；但也说明，你对未来，对现在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对我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早就想退休隐居了。”

《随想录》的日文译者石上韶最早读到《随想录》时，热泪盈眶。他说：“如果我读完就完了，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于是他决意将这部著作翻译介绍给日本读者，后来果然因此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一位日本读者木元贤辅说：“这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文学家写下的真实纪录，他不仅是作家巴金个人的经历，也是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实写照”。另一位日本读者伊泽巨万夫说：“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是痛苦的，但也正说明作者有一颗纯洁的、充满了爱的心。日本人也有类似的体验。当

中国人在思考‘十年不幸’的时候，难道日本人不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深刻反省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吗？”

如果说，巴金给予读者的是深沉的真诚的爱，那么，读者回报的爱也是够热烈而丰厚的了。

巴金在香港访问时，香港大学有一位女学生渴望见到巴金，又怕劳累了巴金，结果只是托朋友转递了一封充满着深情的信。她说：“我真的很希望和您见面，倾谈，好让我得到思想上更多的冲击、成长，但我却又不希望在这旅途上增添劳神的事情。所以只要您知道在香港这小地方，有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爱护您，喜爱您写的东西，向您学习，更会为香港，为祖国付上年青的勇毅就是了。”

无独有偶，香港的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在文章中也是这样深情地说：“读巴金的著作，总会带给我们一线希望，由乌头少年到苍苍白发的时代，这种精神目的，并没因岁月而稍有褪色，致人相信他还保持着像青年人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的提醒我们，他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坚持继续写作，却是像遗嘱般地去写，这两股冲力可能正在他的心里激烈地、痛苦地斗争着。而身为他的读者，一方面希望他继续著作，一方面又恐怕累着了，他，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为我们所爱戴的。”

因此，香港另一位青年记者慨叹说：“报导准确、详尽，乃记者的职责所在，但感情流露的报导，却是十分罕见的。”而香港当时许多关于巴金的报导文章中，都可从“字里行间领受到作者本身所倾露的真情，这是纯发自他们对巴老的尊崇和爱慕之心的。”

这种尊崇，这种爱慕，人们在与巴金接触时经常会油然而生。日本作家高桥谕一郎于1982年访华时终于得到会见巴金的机

会后，他说：“今天是我们来中国最高兴的一天。”日本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于1983年访华时表示要求见到巴金的强烈愿望。当人们告诉她，巴金正患病住在医院时，她说：“我到上海时，那怕到病室去站五分钟，只是看看他，不说话，把这套新书（山崎丰子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两个祖国》）送给他，我就很满足了。”

人们为什么这样尊崇巴金呢？当然因为他的杰出的文学成就。但还不是全部。还因为他的美好的情感和伟大的品格。香港《大公报》记者叶中敏说：“读者对巴老的推崇，不单由于他的作品，更由于他的为人。道德文章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成就的最高标准，在这方面，巴金先生是完全无愧于时代的。”

据说香港中文大学所以颁授巴金以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固然由于他的丰硕的文学业绩，但更主要是因为近几年他所写的《随想录》。有一位香港作家也说：“香港今天之所以有‘巴金热’，其原因也在于此——有时候，读者尊重作家的人格更甚于其作品。”

当然，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只是极小一部分，多数见诸于近几年报章杂志，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的材料。我之所以在这里略加引述是想作一个比较，当海外读者、学者对于巴金已经具有这样尊崇、认识和评价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对于巴金的认识又是怎样呢？如果说，巴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座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那么，我们的发掘还是很不够的。法国作家彼埃尔—让·雷米说过这样的话：巴金像一座巨大的冰山。他通过译本看到的只是这座冰山“露出在水面上的尖顶”，至于这座冰山本身，还有待人们去探测。这使我想起巴金过去常常把自己比作一座“雪下的火山”，贮蓄了那么多的热情，终有一天会有一个大爆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研究探测这座巨大的冰山，或者说得

更确切些，探测这座为雪掩藏下的火山，这座丰富的宝藏，将是我们极重要的任务。

我还想由此说明的是，我们应该把巴金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里去研究，把他的著作、思想、为人等等看作一个带有世界性的现象去探讨，才能理解上述种种强烈反响之所以出现的深刻的时代原因。

我们是否还应该把巴金放在现代中国历史衍变的范围里去考察，看到这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种种不同的代表，不同的典型，无疑的，巴金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孜孜不倦探索真理，迎着时代前进的、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有气节有良知的、坚强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香港学者、《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正在着手准备改写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他认为巴金的一生是一部活的中国历史。离开了中国现代历史，就无法真正认识和评价巴金的真实面貌。我认为余思牧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是否还应该对巴金已经完成的新作——四本《随想录》作出充分的考察和认识。《随想录》的写作，显然是受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影响和启发。看来是一些思想点滴，但却是一部历史的综合，是巴金对于过去和现在、社会和个人所作的深刻的历史的思考和总结。它远不是一个普通作家的个人的随意纪录，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伟大代表的声音。《随想录》的写作，显然也还受了卢梭的《忏悔录》的影响和启发。巴金曾说，他最早写小说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他后来写过许多自传性的散文，认为这“应当是我的忏悔录的一部分”。而现在，他像卢梭宣称《忏悔录》是“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

“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一样，把《随想录》当作向读者所作的“真实的思想汇报”，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留给后人的遗嘱”、“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因此，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是当前许多别的作家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在这篇简短的发言中详细谈到巴金和世界文学的关系。这方面也已有不少专家写了专门文章进行论述。但是，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巴金之所以成为具有世界威望的大作家，与他对世界采取一种开放博采的态度是密切有关的，他不保守，不狭隘，不短视，不自我封闭。他反反复复多次讲过，“不论古今中外，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我都不断地学，不断地体会吸收，不断有所长进”。他认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他自己就承认，“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有一个青年作家喜欢向人宣传，他不读任何作品，免得受人影响。巴金说：“这个人很可能始终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他至今没有写出一本好书。”巴金广泛吸收各民族有益的营养的态度，是一种先进的开放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观点，使他在东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的许多思想、精神、文化是和世界上伟大的进步的文学潮流相通的。在当今世界上，封闭就意味着落伍和倒退。因此，这种思想不仅对于发展中国文学事业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也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总之，从这样一些角度去认识巴金，也许会使我们更接近他，更能准确充分估计他的历史作用。

当然，我们仍然还要进一步研究巴金的过去和现在，研究巴

金的艺术和思想，研究巴金的作品和为人，要去发现和占有更多更详细的材料。我们需要研究。外国人也在研究。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巴金著作被广泛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我相信将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和理解巴金。事实证明，巴金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超出一般的作家研究、评价的问题。因此，我建议同行们团结互助，争取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把深入研究巴金的重任担当起来，我个人只是一个爱好巴金著作、敬慕巴金为人的业余作者，希望前辈和同行们对我的粗浅的意见提出批评和匡正。

* 本文是作者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